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一九二〇年代中國的政治思潮

張玉法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前言

在史前時期，幾萬年或幾十萬年是一個時代；進入歷史時期，幾十年或幾百年是一個時代；進入二十世紀，至多每十年就是一個時代。歷史的變動愈來愈快。1920年代是「五四運動」發生以後的第一個十年。這十年的政治思潮，與前此十年有許多不同，與此後十年也有許多不同。不同的原因，除思想本身的轉變以外，與實際政治關係最大。

1910年代的中國，在政治上發生幾件大事：1912年傳統中國的最後一個皇朝結束，中華民國建立，至少在形式上，以君為主的時代結束，以人民為主的時代來臨。民權高漲，分權主義乘時而興。1916年大總統袁世凱企圖恢復帝制失敗，1917年滿清皇朝企圖復辟也失敗，中央政府的權威因此失墜，中央和地方都由派系不同的軍人控制。在政治上，軍人派系之外，有政黨，有官僚派系，均欲分享政權；在社會上，有言論不同的報刊，有行動不同的團體，均欲參與國政。在這種情形下，政治和社會秩序日益混亂，帝國主義國家的軍事、經濟、文化侵略亦日益嚴重。於是各種救國思想和運動油然而生。有主張發展產業者，有主張改良教育者，有主張廢督裁兵者，有主張實施憲政者，亦有欲廢除政府、軍警等權威，以維護個體自由發展而倡行無政府主義者。加上共產黨在俄國革命成功，社會主義在中國迅速擴張，又使自十九世紀後期以來所引入的西方資本主義、民主主義、個人主義，在中國發展受到威脅。前述種種，為五四時期的思想啟蒙狀態，千巖競秀，看不出主峯。

1920年代的中國，軍閥割據，國家四分五裂，帝國主義國家繼續君臨中國。在政治上發生幾件大事。1921年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大量引介馬列主義，推行共產主義革命。1923年，山東臨城發生土匪劫掠火車、俘虜大批外國人質事件，帝國主義國家假此為藉口，認為中國政府缺乏統治能力，欲共管中國鐵路，國家危在旦夕。有中國青年黨的成立，從事宣傳國家主義、維護國權之運動。1924年，有三十年革命歷史、革命事業不斷受挫、侷促於廣州一隅的中國國民黨實行聯俄容共政策，因為受到蘇俄援助和大量動員工農羣眾加入革命，使黨勢大張，成為中國統一的希望。中共的勢力也得以在國民黨的旗幟下發展。中共原以馬克思的唯物主義和階級鬥爭思想為依歸，1922年以後引進

列寧主義，減緩階級鬥爭的訴求，以反軍閥、反帝國主義作為現階段的奮鬥目標，並以此目標與國民黨聯合推動中國革命。1924年冬，受國共兩黨影響的馮玉祥率部隊推倒在北京政府執政的直系軍人，使孫中山可以自廣州北上宣揚三民主義及革命主張。1925年「五·卅運動」發生，國共兩黨動員學生、工人，對日、英帝國主義國家的在華勢力進行杯葛鬥爭。1926年3月18日，北京發生反軍閥、反帝國主義的示威運動。7月9日，中國國民黨的軍隊自廣州誓師北伐。1927年初，北伐軍進至長江流域，國共兩黨皆力謀擴張勢力。由於中共有取代國民革命領導權之勢，國民黨乃將中共自黨中清除。此後中共另闢武裝革命之路。1928年國民黨完成北伐，成為全國性的執政黨。由於內部的權力分配不均衡，引起一連串的軍事反抗；而國民黨實施一黨訓政，壓制異黨勢力，排除孫中山思想體系以外之思想，使政學界發生反彈。於是各種政治思潮湧起。大部思潮皆由1910年代延續而來，但在1920年代開始壯大；部分思潮則為對新思潮的反動，亦有由現實政治的激盪而產生的。

1920年代的政治思潮所以洶湧，除前述政治大事件的影響外，主要有兩個因素。第一個因素是政黨多，各政黨內有許多派；一些無黨者，亦分許多派。這些黨派各有不同的思想或主義，具體的政治主張更是彼此分歧。就政治主張而論，國民黨當權派主張一黨政治，周震麟、黃一歐一派主張多黨政治，吳敬恆、李石曾一派則為無政府主義者。中共當權派主張工農聯盟，托派主張工人專政。無政府主義派有主張與現政府絕裂者（劉思復），有主張與現政府作有限度妥協者（江亢虎），有欲利用現政府以達大同世界者（吳敬恆）。自由主義派有從教育著手者（蔡元培），有從政治著手者（胡適）。保守主義派有欲回復中國固有社會文化者（梁漱溟），有欲發揚傳統中國政治中之優點者（但燾），有欲牽就現實、徐圖建立政治秩序者（章炳麟）。諸多主張的背後，都有其思想或主義的背景，容後論述。

第二個因素是各個黨派都辦了許多期刊，宣揚其思想或主義，更有些著名的思想家出版了專書，使政治思潮有澎湃之勢。在刊物方面，國民黨的西山會議派有《再造旬刊》（1928年3月創刊）、《先導月刊》（1928年6月創刊）、《正軌月刊》（1928年9月創刊）、《致力月刊》（1928年10月創刊）、《統一月刊》（1928年10月創刊）、《晨光月刊》（1928年12月創刊）、《革命論壇》（1929年在上海創刊）等。國民黨的改組派有《新生命》（1928年1月在上海創刊，周佛海主之）、《革命評論》（1928年5月在上海創刊，陳公博主之）、《青年呼聲》（1928年5月在上海創刊，童冠賢、周佛海等主之）、《前進半月刊》（1928年6月在上海創刊，顧孟餘主之）、《革命戰綫旬刊》（1929年6月在上海創刊，谷正綱主之）等。國家主義派（青年黨）有《醒獅週報》（1924年10月創刊）、《新路》半月刊（1928年2月創刊）等。共產主義派有《中國青年》、《勞動青年》、《嚮導》、《鐵錘》、《布爾札維克》、《無產革命》、《中國農民》等。¹在

¹ 司馬仙島：《北伐後之各派思潮》（北平：鷹山社出版部，1930年），頁12，74，127-28，152-57。

出版的專書方面，1921年，吳虞的《吳虞文錄》出版(亞東圖書館)，胡適的《胡適文存》出版(亞東圖書館)。1922年，陳獨秀的《獨秀文存》出版(亞東圖書館)，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出版。1926年，孫中山的《中山叢書》出版(太平洋書店)。1927年，梁啟超的《飲冰室文集》出版(中華書局)等。²

在論述各派思潮以前，對本文的用詞(思想、主義、思潮)略作說明。「思想」是較為靜態的，可能是一個人的，也可能是許多人的，但彼此很少或尚未產生互動關係，也不一定要付諸實施。「主義」是動態的，可能是一個人的，也可能是許多人的，彼此有很多或已產生互動關係，是要付諸實施的。「思潮」有三種形式：一是宣傳中的思想，二是思想向主義發展的波動狀態，三是宣傳中的主義。因此，思潮是動態的，是許多人的，是彼此互動的，是要付諸實施的。

社會主義思潮

1910年代，清朝剛滅亡，民國初建立，中國加強引進西歐文明。西歐文明的主要內涵是：「精神是愛自由的個人主義，生產方法是私人資本主義，政治組織是英國遺風的代議政治。」1917年社會主義革命在俄國成功，1918年歐戰結束，中國知識界對資本主義擴張所引發的帝國主義戰爭作過反省。1919年「五四運動」發生，全國上下反對帝國主義國家壓迫中國。到1920年代，中國的思想運動轉向社會主義。胡適曾說：「歐戰以後，……個人財產神聖的理論遠不如共產及計劃經濟的時髦了；世界企羨的英國議會政治也被詆毀為資本主義的副產品了。」中國於1910年代所欲引進的資本主義文化是以個人為根本，1920年代所欲引進的社會主義文化則是以社會為根本。³

社會主義有三大派：無政府主義較激進，基爾特社會主義較溫和，馬克思主義居中。茲先介紹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為成立於1921年的中國共產黨所信奉。1910年代後半期到1920年代，馬克思主義先後由李大釗、陳獨秀、瞿秋白、毛澤東等人引介與闡釋；其間由於中共黨中央引進列寧主義，瞿秋白、毛澤東受列寧主義的影響較大，使瞿秋白、毛澤東思想與李大釗、陳獨秀有很大不同。李大釗(1888-1927)，直隸省人，北京大學教授，為最早信仰並宣揚馬克思主義者，1916年在〈青春〉、1918在〈今〉等文中表達了唯物辯證的宇宙觀；1920年代在〈史觀〉、〈唯物史觀在現在史學上的價值〉等文中，闡釋了唯物史觀；1922年在〈平民政治與工人政治〉等文中，闡釋了無產階級專政的趨勢與意義。⁴ 1925年6月任中共北方區黨務委員會領導人。

² 郭湛波：《近代中國思想史》(香港：龍門書店，1973年)，頁502-4。

³ 陳高備：〈中國文化的過去與今後〉，《新中華雜誌》第2卷第1期(上海：中華書局，1934年1月10日)，頁93-95。引胡適語見〈建國問題引論〉，《獨立評論》第77期(1933年11月19日)，頁3。

⁴ 郭湛波：《近代中國思想史》，頁345-57；劉紹唐(主編)：《民國人物小傳》(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5年)，第一冊，「李大釗」，頁72-74。

陳獨秀(1880-1942)，安徽人，北京大學教授，先後主編《新青年》及《嚮導》，1921-1927年間任中共中央領導人。陳早年醉心於西方的民主政治，1920年開始對馬克思主義發生興趣。1920年9月在〈談政治〉一文中(《新青年》8卷1號)介紹階級鬥爭，並宣言要以階級鬥爭建立勞動階級的國家，以取代資產階級的國家。但在陳獨秀接受馬克思主義時，由於蘇俄在革命成功後受到資本主義國家的敵視與包圍，在1920年7月共產國際已決定加強世界各地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反帝國主義鬥爭，暫時停止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革命，俾與中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者形成統一戰綫，共同對抗資本帝國主義。所以1921年中共成立後，共產國際即派人敦促中共與國民黨合作，共同反抗資本帝國主義。1922年中共二大會時，討論列寧的反帝理論，遂即決定加入共產國際，並以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為奮鬥的目標。作為中共中央領導人的陳獨秀，與第三國際對中國革命的看法並不一致。第三國際認為中國仍處封建時代，革命應以農民暴動為主；陳獨秀認為中國已為資本主義社會，不反對農民革命，然應同時注重工人罷工及世界革命。1927年國共分裂後，陳獨秀下臺，瞿秋白接任其中共中央領導人的職務。當時中共已移入內地，遠離帝國主義所在的通商口岸；更從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轉到反封建的社會革命；政綱改為要求土地改革和農民暴亂。⁵

繼陳獨秀為中共中央領導人的瞿秋白(1899-1935)，江蘇省人，北京俄文專修館肄業，1920年9月受北京《晨報》委託，赴俄考察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瞿於1920年初開始傾心社會主義，是因為「帝國主義壓迫的切骨痛苦，觸醒了空泛的民主主義噩夢」。1920年冬至1922年春先後出版《餓鄉記程》、《赤都心史》二書，記載了他從民主主義至社會主義、從唯心主義向唯物主義轉變的歷程。在樹立了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以後，瞿秋白即以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重新觀察中國文化和中國歷史。瞿秋白於旅俄期間加入中共。1923年1月回國後，曾任上海大學教務長兼社會學系主任。前述李大釗、陳獨秀對歷史唯物主義介紹較多，對辯證唯物主義介紹較少。瞿秋白可以說是第一個深入介紹辯證唯物主義的人。根據他的介紹，宇宙的一切事物都是發展的歷程，研究事物要注意它的變易與互動。所謂矛盾就是「趨向不同的各種力量之相對抗」；「物的矛盾及事的互變是最根本的原理，——沒有矛盾互變便沒有動，沒有動便沒有生命及一切現象」。瞿秋白認為：「一切變易起於永久的內部矛盾、內部的鬥爭。」同時認為「自然界、社會關係及思想都連環不斷的否定」(引見所著《社會學概論》、《現代社會學》)⁶。

⁵ 郭湛波：《近代中國思想史》，頁303，310-12；Richard C. Kagan(著)、詹宏志(譯)：〈陳獨秀：從反傳統到民族革命〉，載周陽山、楊肅獻(編)：《社會主義》(臺北：時報出版公司，1980年)，頁352，355-57；李興華：《中國近代思想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489-92。

⁶ 袁偉時：《中國現代哲學史》(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57年)，頁623-45。

瞿秋白有關馬克思主義的論述，多為他在上海大學教書時的講義。他除編寫講義、教育青年外，也參加政治論爭。當時國民黨實行聯俄容共，中共已在國民黨中發展勢力。中共在國民黨內部的發展，引起國民黨要員戴季陶的側目；戴曾著書反共。瞿秋白為了鞏固中共與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綫的政策，一面著文駁斥戴季陶，一面寫〈CP與中國國民黨〉，對中共黨員、團員說明中共必須加入國民黨的理由。在1927年國共決裂前夕，更著〈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闡明中國是誰革誰的命，以及無產階級應如何去爭取此革命中之領導權等問題。他的主旨是：組織農民，實行耕地農有，中共和士兵及一般反帝革命分子應以國民黨為中心集結，而領導者由中共擔任。⁷ 其後中共雖與國民黨決裂，進入鄉區，組織農民，從事革命的政策則始終不變。

在推動革命的過程中，馬克思主義注重動員工人，列寧主義則兼重農民。列寧在1917年2月革命以前就主張「工農革命民主專政」。瞿秋白繼承了列寧主義，他在1923年9月撰寫〈自治主義至社會主義〉，提出「勞農平民的革命民權獨裁制」的理想；1927年寫〈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時又提出「工人階級自己的解放，必須與農民聯盟」。⁸ 事實上，繼承列寧主義的不限於瞿秋白一人。如前所述，1922年的中共二大，接納了列寧的反帝反封建理論；1925年的四大則接納了列寧對農民問題的主張。四大〈對於農民運動之決議〉中指出：「中國共產黨與工人階級要領導中國革命至於成功，必須盡可能地、系統地鼓動並組織各地農民逐漸從事經濟的和政治的爭鬥。」在中共的重要幹部中，毛澤東於1926-1927年間對兩湖農民問題作了調查分析。當時中共尚與國民黨合作推動國民革命，毛認為「農民問題是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不起來參加並擁護國民革命，國民革命不會成功」。原因在於「經濟落後半殖民地的農村封建階級，乃是國內統治階級、國外帝國主義之唯一堅實的基礎，不動搖這個基礎，便不能動搖這個基礎的上層建築物」。⁹ 自1927年中共與國民黨分裂以後，因為主要的活動地區在農村，中共的革命基本上是農民革命。

瞿秋白雖然認清了農民的重要角色，但因他們的活動範圍主要在城市，他實際上沒有擺脫城市中心的影響。1927年國共分裂以後，毛澤東、朱德在江西農村建立革命根據地，毛澤東於1928年10月到1930年1月先後起草了〈中國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井崗山的鬥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重要文件，描述並論證了農民武裝割據的小塊紅色根據地如何在四周的白色政權包圍中能夠生存和發展的條件、狀況和原因，並提出了「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思想。¹⁰

⁷ 鄭學稼：〈瞿秋白的一生〉，載周陽山、楊肅獻：《社會主義》，頁399，402，405。

⁸ 同上注，頁403。

⁹ 毛澤東：〈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1926年9月），轉引自袁偉時：《中國現代哲學史》，頁658。

¹⁰ 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臺北：天龍圖書公司，無出版年份），頁196，198。

上述為中共主流派的思想發展。1927年中共被國民黨清出以後，共產黨的譚平山、國民黨的鄧演達等組織第三黨，主張廢止私有財產，將生產資本收歸國有，實行土地革命，建立以農工為中心的平民政府，以農民暴動為手段。可視為中共的右派；¹¹ 陳獨秀自被罷去中共中央領導人的職位後，堅持無產階級世界革命，被稱為托派，實為中共的左派。茲不多論。

1920年代在中國的社會主義思潮除馬列主義以外，尚有無政府主義和基爾特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為社會主義的左派，其反對私有財產制、主張消滅階級、實行共產、破除宗教迷信，與共產主義同；其廢除國家、反對強權、反對組織、要求尊重個人，與共產主義異。¹² 無政府主義在1900年代即自法國、日本傳至中國，1910年代至1920年初相當活躍，1927年以後漸趨衰落。主張無政府主義的人，有劉思復、李煜瀛、吳敬恆、江亢虎等，他們在不同的年代投入此信仰，又各因個人的經歷、處境、認識，而信仰的程度不同，可大致分為三派：（一）與國民黨合流或較接近的一派，以李煜瀛、吳敬恆為代表，他們積極反共，於1927年5月在上海辦《革命周報》宣揚無政府主義，並於那年夏天在上海辦上海大學，吸收思想激進的青年，灌輸無政府主義思想，並使他們從事工農運動，以與中共的工農運動對抗。此派在政治上主張分治合作，以比附蒲魯東的自由互助。1920年代由章炳麟推動、各省軍人贊成的聯省自治，國民黨在地方黨務上於各地設政治分會和在教育上建立大學區制，此派均贊同。章炳麟贊同聯省自治，也是因為他有無政府主義思想。章認為中國既不能絕對無政府，則應當盡量使地方權力加重而使中央權力減輕。（二）既反共又反國民黨、並從事引介和宣傳無政府主義的一批文人，代表人物多來自四川，如盧劍波於1920年前後接受無政府主義，1921年4月曾與胡邁在南京創辦《民鐸》雜誌，後又逃至北京、上海，並在上海恢復《民鐸》雜誌（該刊於1925年為國民黨查禁）。巴金於1927年初曾去西歐、北美研究無政府主義，歸國後從事譯介和宣傳無政府主義，1930年以後轉而從事藝文活動。¹³（三）江亢虎一派：江亢虎於清末民初即倡無政府主義，曾成立中國社會黨。黨義駁雜不純，但亦受到政府的鎮壓。1920年遊俄歸來，重組中國社會黨，並於1924年6月在上海正式發表宣言，提出新民主主義和新社會主義的主張。新民主主義包括三點：（一）選民參政：願為議員及官吏者，須通過參政考試，及格者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二）立法一權：即中央、省、縣皆設單一議會，由議會選出各級行政委員。（三）職業代議：選民必隸一種職業，依各職業選民

¹¹ 司馬仙島：《北伐後之各派思潮》，頁2-6；史全生（主編）：《中華民國文化史》（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中），頁455-56。

¹²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無政府主義 中國社會黨》（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51年），頁157。

¹³ 史全生：《中華民國文化史》（中），頁465-67；李煜瀛、吳敬恆一派主張分治合作，見《北伐後之各派思潮》，頁23，28-39；章炳麟的主張，見姜義華：《章太炎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644-47。

人數定應選議員之比例。新社會主義包括三點：(一)資產公有：資指資本——金錢、機器、商品，凡用以生產者；產指天然資產，土地、礦物、森林等皆是；公有依性質可區分為國有、省有、縣有、市有、村有等。(二)勞動報酬：各盡所能，各取所值。(三)教養普及：舉凡孕婦、兒童、老弱、廢疾、無靠之人，以及一切學校、醫院、道路、水火、公益之舉，皆由地方政府負責教養或辦理。¹⁴

基爾特社會主義為社會主義的右派，以研究系的張東蓀為代表。基爾特社會主義初倡於1919-1920年間，言論見於《解放與改造》、《改造》等刊物。基爾特社會主義者反對馬克思主義，主張透過同業公會從事和平漸進的社會改革，並主張先發展產業，再講社會主義。1920-1921年間，主張馬克思主義的《新青年》與主張基爾特社會主義的《改造》有頗多論爭。¹⁵

三民主義思潮

作為1920年代的政治思潮，社會主義是左派，自由主義是右派，三民主義則居於二者之間。三民主義思想係孫中山從中國傳統思想和近代西方思想中綜合創造而來。孫中山的民族主義在辛亥革命以前側重推翻滿清的統治，民國建立之初主張國境內的民族以漢族為中心融合成一個中華民族。歐戰以後，受美國總統威爾遜民族自決思想的影響，提出反帝國主義的主張，並主張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孫中山的民權主義，主要形成於辛亥革命時期。以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權為政權，使民權行使超越代議政治，而有更多的途徑；以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權為治權，使治權的行使超越西方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權而更趨分散。到1920年代，民權主義又加入兩點：一為權能區分，即人民有權，政府有能，互相制衡，互相尊重。二為均權制度，即治權不偏於中央集權，亦不偏於地方分權，將中央權與地方權加以劃分。民生主義，在辛亥革命時期提出的為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平均地權的辦法是自報地價，照價收稅，照價收買；節制資本的辦法是大企業國營，中小企業民營。1920年代民生主義的土地政策有所轉變，孫中山特別提到「民生主義真的要達到目的，農民問題真的完全解決，是要耕者有其田」（見民生主義第三講）。耕者有其田的構想來自亨利·喬治(Henry George)。到1924年，孫中山又以蘇俄為例證，他在〈耕者要有其田〉的講演中說：「現在俄國……推翻一般大地主，把全國的田地都分到一般農民，讓耕者有其田。耕者有了田，只對於國家納稅，另外便沒有地主來收租錢，……我們現在革命，要仿效俄國這種公平辦法，也要耕者有其田，才算是徹底的革命。不過，孫中山耕者有其田的方法是和平的、漸進

¹⁴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國無政府主義和中國社會黨》，頁210-18。

¹⁵ 周陽山、楊肅獻：《社會主義》，頁203-4。

的。至於他在民生主義的講演中曾說「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是因為當時國民黨正在聯俄容共，孫不過為國共合作找基礎，實際上他對馬克思主義的批評很多。¹⁶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思想在1924年公開講演三民主義時大體定型。此後到1925年孫中山逝世，甚至到1927年國共分裂前，追隨他的黨徒，基本上對三民主義的理論無所貢獻，只是對三民主義作不同程度的認定與解釋而已。支持孫中山聯俄容共政策者當時被稱為左派，以廖仲愷、汪精衛為代表。廖對反帝國主義有激烈的表現，他反對基督教，鼓吹廢除外人的租借地和治外法權，重視1925年的「五·卅慘案」而掀起的省港大罷工。¹⁷ 這些既符合列寧和孫中山的反帝政策，也符合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汪精衛因任黨主席，為聯俄容共政策的執行者，與俄國顧問鮑羅廷最接近。反對聯俄容共、堅持國民黨黨統的國民黨員當時被稱為右派，可以戴季陶、胡漢民為代表。戴季陶自1922年即持反共態度，1924年孫中山實行聯俄容共後，戴往來於上海、廣州間，但很少過問黨事。1925年孫中山逝世後決心維護並發揚三民主義，一方面促使國民黨接受孫中山的遺囑；一方面強調應以孫中山的遺教為建國的最高理論與領導原則。1925年8月出版《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強調國民黨的獨佔性、排他性、統一性、支配性。開啟了是年11月反共派的執監委在北京西山集會決議分共之先聲。1929年3月，國民黨召開三全大會，由戴季陶起草、由中央常務委員會向大會提出，擬定以孫中山的五種遺教作為訓政時期的最高基本法。¹⁸ 戴季陶對宣揚三民主義的最大貢獻是對孫中山民生史觀的闡述。孫中山於1924年實行聯俄容共之始，即批評馬克思的唯物史觀，而提出民生史觀，認為歷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質。戴季陶於孫中山逝世後，除出版《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鼓吹以行動反共外，另出版《孫文主義之哲學基礎》，強調三民主義的原理全部包括在民生主義之內，其哲學基礎是中國固有的倫理道德。戴認為唯物史觀和階級鬥爭的理論不可信，要求把經過他闡釋的三民主義拿來解決世界的問題。¹⁹ 戴將三民主義的來源完全本土化，自然與外來的馬克思主義有截然劃分的意思。所以有戴季陶參與在內的，主要成員為鄒魯、林森、邵元沖等人的西山會議派，在理論上特別強調民族主義和復興王道文化。²⁰ 胡漢民於1925年因牽涉廖仲愷遇刺案，被派往俄國。依據他的觀察，俄國革命的成功，得力於列寧，並認為列寧在俄國為右派，因為列寧所實行的不是無產階級專政，農民、小資產階級也都被納入。1927年胡漢民自俄國歸國後，對俄

¹⁶ 蔣永敬：〈孫中山〉，收入王壽南（主編）：《中國歷代思想家》（五〇）（臺灣：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年），頁135-38；李澤厚：《中國近代思想史論》（臺北：谷風出版社，1986年），頁480-81，457-59，520-24。

¹⁷ 周陽山、楊肅獻：《社會主義》，頁299-300。

¹⁸ 李雲漢：〈戴季陶〉，收入王壽南：《中國歷代思想家》（五五），頁45-49，55。

¹⁹ 袁偉時：《中國現代哲學史稿》，頁803-4，812-13，816-17，820-21。

²⁰ 史全生：《中華民國文化史》（中），頁451。

國的右派大為讚揚。事實上，列寧於1921年所發布的新經濟政策，就是右傾的政策：（一）允許小工業暫歸私人管理；（二）給外國人以租借地方的權利，以利用外資開發俄國的產業；（三）獎勵生產及消費合作社的組織。孫中山大為讚揚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孫中山思想中的借用外資、中小企業民營，可能即來自列寧的新經濟政策。胡漢民對三民主義的解釋與戴季陶不同的地方是：戴認為三民主義以民生為中心，民族、民權都是手段，頗合孫中山之意。而胡漢民著《三民主義的連環性》，將民族、民權、民生置於平等的地位，謂以民族為目的則以民權、民生為手段，以民權為目的則以民族、民生為手段，以民生為目的則以民族、民權為手段。²¹ 胡的解釋似是獨樹一幟的。

國民黨中，以和平方式反共的是戴季陶、胡漢民和西山會議派，以武力反共的則為蔣介石。蔣於1926年3月20日發動中山艦事件，壓制並約束中共在國民黨中的活動；1927年4月12日清黨，直接對國民黨內的中共人員進行逮捕和殺害。蔣介石出身軍人，在此期間對三民主義無所發揮。但在北伐完成後，他就強調一個主義、一個政黨。1929年，蔣介石宣稱，除了三民主義思想以外，不允許有其他思想；並認為以黨治國，就是國民黨一黨專政。²² 到1930年代，蔣更倡導法西斯主義，進一步強調一個領袖。

國民黨清黨後，汪精衛一派承襲了1924年國民黨改組實行聯俄容共所採取的農工政策，自1928年夏間倡導重新改組國民黨，以應社會需求。他們攻擊蔣介石獨裁，並指出黨中多腐化分子和投機分子。汪精衛的反共立場和以黨治國的主張，與蔣介石一致，惟主張黨政系統分離，各司其職；對社會團體，以輔導代替控制；黨要在羣眾之中，而非在羣眾之上。²³

國民黨以黨治國的方式很多，1926-1927年間開始討論的黨化教育，可為一例。當時對黨化教育的界定頗多。韋慤在〈國民政府教育方針草案〉中說：「所謂黨化教育，就是在國民黨指導之下，把教育變成革命化和民眾化。換句話說，我們的教育方針要建築在國民黨的根本政策上。國民黨的根本政策是三民主義、建國方略、建國大綱，和歷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宣言和決議案；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根據這幾種材料而定。」黨化教育在教育方向上，要重視產業教育（養成生產的能力）、政治教育（養成統制社會的能力）、軍事教育（養成戰鬥的能力），並收回教育權。在教學內容上，要使學校的課程能發揚黨義，實施黨的政策。²⁴

1928年8月，大學院頒布訓令，要求各級學校必須開設黨義課程，以便對學生進行三民主義的政治教育。各級學校黨義課程的內容是：（一）小學：孫中山的革命史實、三

²¹ 司馬仙島：《北伐後之各派思潮》，頁71，119-20，122-23。

²² 史全生：《中華民國文化史》（中），頁470；司馬仙島：《北伐後之各派思潮》，頁103-5，140。

²³ 史全生：《中華民國文化史》（中），頁459-61。

²⁴ 舒新城：《近代中國教育史料》（上海：中華書局，1927年），第四冊，補編〈黨化教育〉。

民主義淺說、民權初步演習；(二)中學：建國大綱淺釋、建國方略概要、三民主義、五權憲法淺釋、直接民權運動；(三)專門以上學校：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之理論與實際、國民黨政綱及重要宣言與決議案、五權憲法之原理與運用。此一訓令，到1929年9月即加實施。²⁵

國家主義思潮

國家主義為中國青年黨標榜之主義。中國青年黨於1923年12月2日成立於巴黎，由曾琦發起，參加者有李璜等人。起因於是年5月發生臨城劫車案，引起國際共管中國鐵路之議，兼以旅歐中共黨團興起，曾琦為謀對抗此類國際主義的威脅，乃發起組織青年黨。其成立的宗旨是：「本國家主義之精神，採全民革命的手段，以外抗強權，力爭中華民國之獨立與自由；內除國賊，建設全民福利的國家。」1924年，青年黨黨務移國內。²⁶是年10月在上海創《醒獅週報》，共出刊一百五十九期，至1928年11月而止。1928年2月創刊《新路》半月刊，共出刊八期，至是年5月而止。其他刊物多創於1930年代及以後，不備述。

青年黨的基本主張，在1924年10月宣布於外的共有四點：(一)主張和平的自衛的國家主義，反對世界主義和共產主義；(二)主張全民革命，聯合農工商學各界建設全民政治，反對一階級專政之獨裁政治；(三)主張對內不妥協，對外不親善；(四)主張內除國賊，外抗強權。²⁷

關於國家主義，青年黨的刊物中不斷有文從不同的角度加以闡釋。李璜於1924年10月在〈釋國家主義〉一文中引介西人之說，對國家主義作四方面的說明：(一)國家主義乃是對於其所屬的國家而有的一定的志願；(二)國家主義乃是被壓迫的國性的政治上的要求；(三)國家主義乃是疾視一切所有不以國家的舊信仰為根本的學說；(四)國家主義乃是反乎國際主義而言。同時並作了進一步的申述：「凡足以恢復或表現我們國家的人格，凡足以振起或團結國民的精神，凡足以發展或豐富國民的生計，則國家主義的政策當期不遺餘力以趨赴之。」²⁸

關於內除國賊，外抗強權，曾琦於1924年10月在〈「內除國賊外抗強權」釋義〉一文中對國賊及強權的意義作了介定。國賊的定義列舉了十個，僅舉四個作為示例：(一)盜賣國權、摧殘民命之軍閥；(二)假借外力、爭奪政權之政黨；(三)勾結外人、掠奪國

²⁵ 邱樹森、陳振江(主編)：《新編中國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四冊，頁354。

²⁶ 陳正茂：〈中國青年黨史料叢刊序言〉，見1995年國史館重印《新路半月刊》合訂本。

²⁷ 見1993年國史館重印《醒獅週報》第一冊正刊前頁廣告。

²⁸ 同上注，第一號(1924年10月10日)第四版、第五號(1924年11月8日)第一版。

富之財閥；(四)依仗外人、壓制同胞之教徒。強權的意義列舉了四個：武力侵略者、文化侵略者、經濟侵略者、宗教侵略者。²⁹

到1928年2月，國家主義者在《新路》半月刊發刊詞中，標舉了十二項政治主張，要點如下：(一)主張民主政治，反對帝制及一階級專政、一黨專政；(二)主張國家在國際間之獨立與平等，反對外力侵略及一切賣國及誤國之暴動；(三)主張言論、結社等自由，反對以黨治或軍治之名義剝奪人權；(四)主張以自治精神謀統一，反對一切征服式之武力統一；(五)主張開發生產，改善農工生活，反對階級鬥爭及其他妨礙經濟發達之運動；(六)主張倡明本國文化，發揮科學精神，反對漫無擇別之守舊與生吞活剝之驚新；(七)主張司法完全獨立，反對司法之黨化及軍法裁判之濫用。³⁰ 政綱的意旨，反對中共的階級革命和國民黨的一黨專政，至為明顯。

除一般性的宣示外，國家主義者亦從教育、經濟等各方面宣示其觀念。教育方面以收回教會學校的教育權討論最多，³¹ 經濟方面則主張限制外貨進口和限制外人在華設廠爭利。³²

國家主義提出後，受到各方面的抨擊。社會主義者認為國家主義是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之始作俑者；欲打破軍國主義、帝國主義，必先打破國家主義，把種族界綫一筆勾銷，以謀世界永久和平。³³ 無政府主義者不但反對國家主義，而且反對國家的存在，因為國家妨害個人自由，非人類本來的需求。³⁴ 共產主義者標榜以國際立場解決問題，以世界平民為一家，亦抨擊國家主義者民族自覺、國家自強的觀念。³⁵

國家主義者對各方抨擊的意見一一駁斥，並將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包括在國家主義之中。認為民族主義主張排滿清，以漢族為中心「獨立建國」，結合漢、滿、蒙、回、藏諸族成大中華民族是國家主義；民權主義主張伸張人民之權力，求平等生活於一國之內，而不容任何一階級之專政，此為民主共和之涵義，包括在國家主義之中；民生主義

²⁹ 同上注，第二號(1924年10月18日)第一版。

³⁰ 《新路》第1期(1928年2月)，頁3-4。

³¹ 如陳啟天：〈與朱經農君論國家主義的教育問題〉，《醒獅週報》第二十三號(1925年3月14日)，第二版至第四版；又如《中華教育界》14卷8期有「收回教育權運動號」，引見古樸：〈論國人應注意收回教育權運動〉，《醒獅週報》第二十五號(1925年3月28日)，第二版至第三版。

³² 李璜：〈述國家主義的經濟學〉，《醒獅週報》第二十六號(1925年4月4日)，第四版。

³³ 陳逸凡(講)、吳俊升(記)：〈國家主義〉，《醒獅週報》第十一號(1924年12月20日)，第三版。

³⁴ 李璜：〈國家主義答客難〉，《醒獅週報》第十二號(1924年12月27日)，第二版。

³⁵ 同上注，第十五號(1924年1月24日)，第一版。

主張之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為一種緩進的社會政策，亦包括在國家主義之內。³⁶ 惟國家主義者既反對一黨專政，自然受到國民黨的排斥。

自由主義思潮

西方自由主義於1900年代由嚴復、梁啟超等介紹到中國來，但他們不一定是自由主義者。在1910年代，嚴復的思想轉趨保守，梁啟超則捲入實際政治。到1920年代，梁啟超進入學術文化界，發言立論，頗富自由主義的色彩。第一，他反對暴力，反對用革命的手段，因此對中共領導的工農運動抱敵視的態度。他指責工農運動破壞社會生產力，鬧得中產階級不能生存，工廠倒閉，工人失業。實際上，早在1900年代，他即推動和平改革，反對用革命的暴力手段推翻滿清。第二，對資本主義的弊病，他主張用緩進的改革辦法，一方面對那些正在勃興、能為本國增加生產的資本家，承認其對社會的貢獻；另一方面則希望透過政府立法、社會監督，使資本家顧及到勞動者的利益，以緩和勞資兩階級的矛盾。³⁷ 關於此點，亦如他於晚清投入政治改革運動、民初投入實際政治，都是希望透過點點滴滴的改革，使政治逐漸改良。

梁啟超是1900年代介紹自由主義的理論家，也是1900年代中國思想界最重要的主導者。進入1910年代和1920年代，自由主義的代表應為蔡元培和胡適。蔡元培的表現主要在教育上，他於1917年開始任北京大學校長。他的辦學理念是：大學不是政府官吏的養成所，而是研究高深學問的機構和改造全國道德、思想的中心。他鼓勵教職員和學生參與校政，聘請學有專精、學術觀點不同的人任教，使學生充分發展個人的人格。³⁸ 蔡元培主張教育獨立、學術自由。1927年國民政府北伐進抵長江流域，蔡希望教育能獨立於政府之外，創大學院制度，將全國劃為若干大學區，區內教育由該區之大學管理。嗣因國民政府內部黨化教育派搶奪教育權，終以教育部取代大學院。1928年蔡另創中央研究院，原望維護學術自由，但其後國民黨一黨訓政，剝奪人民各種自由。蔡於1932年12月17日組中國人權保障同盟，導致其得力助手、中央研究院總幹事楊銓被暗殺。蔡為國民黨的革命元老，在國民黨執政後，自由主義的環境較革命以前為劣，蔡的心情是落寞的。他於1928年和1930年先後寫了〈三民主義的中和性〉和〈中華民族與中庸之道〉，一面反對布爾賽維克主義，一面反對法西斯主義，其針對性非常明顯。附帶一提的，此期間蔡元培的反帝思想甚為濃厚。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蔡主張由中國單方面宣

³⁶ 曾琦：〈悼孫中山先生並勗海內外革命同志〉，《醒獅週報》第二十四號（1925年3月21日），第三版。

³⁷ 耿雲志、崔志海：《梁啟超》（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372-74。

³⁸ W. J. Duiker(著)、戚雯英(譯)：〈蔡元培的人文主義與民國的教育改革〉，載周陽山、楊肅獻：《自由主義》，頁301-2。

布廢除不平等條約，毋需徵得各國同意。1928年「五三慘案」發生，蔡於是年8月正式向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提案，力呈「回復關稅自主，撤廢領事裁判權」。³⁹

胡適的自由主義較蔡元培為寬闊。1920年，胡適與蔣夢麟等北大教授所發表的〈爭自由的宣言〉說：「我們不願意談實際的政治，但實際的政治卻沒有一時一刻不來妨害我們。」此時胡適接受了丁文江所說的「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會改善的必要條件」，於1922年創刊《努力週報》，並與蔡元培、丁文江等聯名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主張建立一個新的、好的政府，來推動政治改革。胡適在1920年前後，提倡個人主義，他的自由主義應該是個人式自由主義(individualistic liberalism)，但在1920年代，他顯然轉向集體式的自由主義。他在1922年發表的〈五十年來之世界哲學〉中，讚揚干涉主義為人民謀福利，可保障社會的弱者，限制社會的強暴，維持多數人民的自由。他在1930年所發表的〈東西文化之比較〉一文中，又讚揚社會主義可以補充個人主義所產生的各種弊端。⁴⁰

自由與民主不可分，1922年胡適等在〈我們的政治主張〉中提出「好政府主義」，所謂好政府，在胡適看來就是「憲政的政府」。只有憲政的政府才可以謀求全民福利、保障個人自由。⁴¹ 胡適在1920年代前半期謀在北京政府主持下實行憲政無結果，到1920年代後半期國民黨執政，繼續希望國民黨實行憲政。他於1929年7月在《新月》所發表的〈我們什麼時候才可有憲法〉一文中，指責國民黨的「無憲法的訓政只是專制」，認為憲政可以保障人民權利，憲法可以限制政府的勢力濫用。⁴²

嚴格說來，胡適在自由主義方面並沒有引進或創發高深的學理，只是追求點點滴滴地改造，1922年他在〈這一週〉一文中說：「我們是不承認政治上有什麼根本解決的。……我們因為不信根本改造的話，只信那一點一滴的改造，所以我們不談主義，只談問題；不存大希望，也不致於大失望。……只有一個得尺進尺、得寸進寸的希望。」由於追求點點滴滴地改造，他既支持中央政府建立憲政政府，也贊同當時各省所進行的「聯省自治」，因為謀求自治的各省也都制定省憲。⁴³ 誠如研究胡適的賈祖麟(J. B. Grieder)所說：「在1910至1920後數年之間，政治、經濟情況動亂失常，當時正人君子都對那些軍閥惡霸之輩敬而遠之，自己則潔身自好，圖能藉正己之身以正社會，……胡適深信個人之才能德行必須使之發揮出來貢獻於社會。因此，他自己挺身而出，不但反

³⁹ 陳哲夫：〈蔡元培先生的政治思想評析〉，載蔡元培研究會(編)：《論蔡元培》(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89年)，頁235-36，246。

⁴⁰ 鄭貴和：〈胡適的自由思想〉，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研究所博士論文(1992年)，頁iii，68-69。

⁴¹ 同上注，頁149。

⁴² 同上注，頁152-53。

⁴³ 同上注，頁172-73，178。

對幾個朋友鼓吹的烏托邦式與無政府式的個人主義，也反對獨善其身式的古老傳統的復活。」胡適認為既要改造個人，也要改造社會。⁴⁴

基於此一信念，胡適於國民黨完成北伐、掌理國家大政以後，繼續謀求點點滴滴地改造。1929年3月國民黨開三全大會，上海特別市黨部代表陳德徵於會中提出〈嚴厲處置反革命分子案〉，內稱「凡經省黨部及特別市黨部出面證明為反革命分子者，法院或其他法定之受理機關應以反革命罪處分之」。胡適對此只憑黨部一紙證明便可定罪判刑的提案向司法院院長王寵惠提出抗議。王至5月下旬始回覆，謂該案在全會中並未通過。此期間，國民政府於4月間下了一道保障人權的命令：「凡在中華民國法律管轄之內，無論個人或團體，均不得以非法行為侵害他人身體、自由及財產。」命令中只禁止個人或團體侵犯人權，而不提政府機關，而當時政府機關與黨部機關侵害人民的身體、自由及財產非常嚴重。胡適為此於是年5月在《新月》中發表〈人權與約法〉一文，加以指責，並提出由人民監督並限制國民黨黨權。胡適的文章使蔡元培「不勝佩服」，羅隆基等人更在《新月》上發表文章加以聲援。有關文章嗣後結為《人權論集》一書，胡適在為此書作序時，充分表露了他點點滴滴改造的心志：今日正是大火的時候，我們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大的水點未必能救火，我們不過盡我們一點微弱的力量、減少良心上的一點譴責而已！⁴⁵ 7月2日胡適在與宋子文的私人談話中也說：「我們不問誰在上，只希望做點補偏救弊的工作，補得一分是一分，救得一弊是一利。」⁴⁶

但即使是這樣，當時的國民黨亦不能容忍。1929年6月《新月》被查禁，10月教育部長蔣夢麟對胡適提出警告。約在同時，國民黨開始撰文批判胡適，批判的文章嗣結成《評胡適反黨義近著》。在這種情形下，胡適於1930年5月15日辭去中國公學校長之職，自上海轉往北京。在《新月》被查禁以後，胡適曾手擬一稿，題名〈我們要我們的自由〉。稿中謂：「近兩年來，國人都感覺輿論的不自由。……異己便是反動，批評便是反革命。」又謂：「我們所以要爭我們的思想、言論、出版自由，……大家起來做政府和政黨的指導監督。」⁴⁷

保守主義思潮

不同時代有不同的保守主義內涵，就1920年代的中國而論，從中國歷史文化中尋求國家發展的道路，即為保守主義。當時的保守主義主要的有兩派，一派主張將立國的基礎建

⁴⁴ J. B. Grieder(著)、張振玉(譯)：〈胡適對社會改革的主張與理想〉，載周陽山、楊肅獻：《自由主義》，頁325-29。

⁴⁵ 劉健清、劉慶楚、鄧麗蘭：《蔣介石與胡適》（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頁13-17。

⁴⁶ 《胡適的日記》（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89年），1929年7月2日。

⁴⁷ 歐陽哲生：《自由主義之累——胡適思想的現代闡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264-65。

在農村，可以梁漱溟、章士釗為代表；一派主張發揚中國固有的制度以救現代制度之弊，可以章炳麟、但燾為代表。

梁漱溟，廣西人，北京大學教授。1921年出版《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認為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向後要求，中國文化是以意欲自為調和持中。據1930年梁漱溟接辦《村治月刊》時所寫〈本刊主編之自白〉，他於1923年時即提出「農村立國」的主張。國民黨北伐時期，他決心捨棄西方，走自己的道路。所謂走自己的道路，他說：「否認了什麼？否認了一切的西洋把戲，更不沾戀！相信了什麼？相信了我們自有立國之道，更不虛怯！」到1930年接辦《村治月刊》時，便高舉了「往東走」的旗幟，他說：「以前都是往西走，這便要往東走。……就是先打破他往西走的迷夢，指點他往西走的路無可通。」他的往東走思想，最初見於彙集1920年代和1930年代作品所成的《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一書，指出歐洲近代資本主義的路，和俄國共產主義的路，皆不適合於中國。明確指出：「中國問題之解決，其發動主動以至於完成，全在其社會中知識分子與鄉村居民打拼一起，所構成之一力量。」並且強調說：「革命的知識分子要下鄉間去，與鄉間居民打拼一起而拖引他上來。」但有關鄉村建設的構想和內涵，主要的著作都在1930年代出版，如1934年出版《鄉村建設大意》，1936年出版《鄉村建設理論》等，⁴⁸ 茲不多論。

章士釗在1910年代和1920年代是著名的保守主義者。1922年自歐返國，力倡農村自治及農村定國之說。1923年11月在上海《新聞報》發表之〈農村辨意〉，主張農村定國，其說實本於英國潘悌(Penty)之農村基爾特社會主義，以「聯業」為自治之基礎。⁴⁹ 思想來源雖與梁漱溟之「往東走」不同，將國家發展的道路建基於中國農村則無二致。

章炳麟、但燾於1920年代前半期在《華國》雜誌著文，對當時引介的西方政治制度頗多非議；對傳統中國的諸多制度則頗為揶揄。1924年1月15日章炳麟在〈與章行嚴論改革國會書〉一文中，主張總統由人民直接選舉，反對代議制的國會。認為議員多以政黨為結合中心，以過半數通過糾劾政府甚為不易；又主張監察權應恢復中國歷史上的給事中及御史制度。章炳麟在1900年代即著文反對代議制度，但到1910年代，主政者破壞國家體制，屢解散國會，章懼為官僚張目，乃不再言。1920年代，由於討論改革國會的議論時起，章乃再度著文反對代議制度，主張「以選舉元首、批准憲法之權還之國民」；恢復中國的給事中、御史官職，以執行國會的監察權。給事中的職務是監督政府，自唐迄明，朝廷諭令既下，由給事中分科發抄，以行於部；其行政不便、用人不當者，給事中有封還之權。御史的職務是監督官吏，專主彈劾。清雍正後將御史之職併入都察院。⁵⁰

⁴⁸ 林瑞明：〈梁漱溟的思想與行動〉，《史原》第6期（1975年10月），頁120-27。

⁴⁹ 楊幼炯：〈民初各派社會主義之政治思想〉，載周陽山、楊肅獻：《社會主義》，頁204。

⁵⁰ 《華國》1卷5期（1924年1月15日），頁1-6。

但燾著文立義也訴於中國傳統。1925年3月發表〈自由新詮〉，強調中國古代有自由，而現今之自由多受限制。以任官而論，古代科舉取士，非讀書能文者不可倖進；今則舍軍閥倭幸、黨人親故，莫沾微錄。以言論而論，古者振木鐸於路，使官之有職任者、師之有道德者，咸相規正、胥教誨於其君；今則報紙譏評、書信訊問、街巷談議，皆受檢查。⁵¹ 1925年5月發表〈中夏代議制度論〉一文，痛批代議制度之非，謂選舉不公，邪黨得逞，與官僚狼狽為姦，民眾失其監督。古代監察權，以唐為例，舉劾違法則責之御史臺，糾正行政違失，審駁命令章奏，則責之門下省之侍中、侍郎、給事中等官。另有諫議大夫、補闕、拾遺等職，皆掌侍從規諫，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大則廷議，小則上封。若賢君遺滯於下，忠孝不聞於上，則條其事狀而薦之。⁵² 但燾此文，與上引章炳麟之文，立義相似，而論述更為深入。

結 論

1920年代的政治思潮，大部在1920年代以前已經呈現。由於1920年代以前，黨派的鬥爭尚未激烈，思想的發生、引介、發展都較為平靜。但到1920年代，中國國民黨實行聯俄容共政策，使黨勢擴大，嗣成為全國性的執政黨。中國共產黨謀另起革命，積極在思想上作宣傳，並與國民黨、無政府主義派、國家主義派展開思想鬥爭。中國青年黨感於帝國主義侵略日甚，中共欲引介國際主義，使國家陷於危亡之境；感於國家需要全民投入建設，國民黨一黨專政，中共鼓吹階級鬥爭，皆妨害全民團結；乃作獅子之吼。在這種情形下，無政府主義派和自由主義派，殊少發展空間。自由主義者因倡和平改革，又無力對抗當權派，只有從點點滴滴的改革做起。無政府主義者處此集體主義高漲的時代，除默默耕耘者外，對孫中山「以建民國，以進大同」的理想有所寄託，乃投入勢力最大的國民黨，聲言欲透過國民黨，徐圖推展大同世界的理想。在新思潮競進的狂瀾中，亦有人欲從中國傳統中找尋國家發展的道路，發言立論，除遷就現實外，或主由重建農村做起，或主恢復部分舊制度以救新制度之窮。1920年代的思潮，大體由上述各派互相激盪。

在社會主義派中，無政府主義一派是左派，完全從道德、理想的層次思考問題，不顧歷史與現實，認為只要沒有國家、政府、軍警及其他政治組織，人類便可獲得個體自由。且不論回到原始共產社會，能否獲得個體自由，將國家、政府、軍警及其他政治組織消除，即有根本上的困難。無怪部分無政府主義者選擇了當時強有力的國民黨，並利用國民黨壓制共產主義派、國家主義派，但國民黨本身不可能走無政府主義的路綫，只是利用他們打擊其他黨派而已。基爾特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中的右派，希望從「企業聯

⁵¹ 同上注，2期5冊(1925年3月)，頁1-7。

⁵² 同上注，2期7冊(1925年5月)，頁1-8。

合」做起，達到經濟平等和個人自由的目的，不需要流血革命。且不論上層政治結構和外環境能否允許企業自由聯合、對外保持獨立，「企業聯合」的內部能否產生經濟平等和個人自由仍有疑問。共產主義派是社會主義中的中間派，馬克思發現了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階級壓迫，鼓吹階級鬥爭；列寧發現了在殖民社會中帝國主義的壓迫，鼓吹反帝。馬克思將人類歷史分為五個階段，即原始共產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當今為資本主義社會，應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列寧認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仍是封建社會，軍閥、地主皆為封建堡壘，為了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進行革命，必須與小資產階級聯合，進行反封建反帝國主義的鬥爭。繼列寧而掌握蘇共領導權的史大林執行列寧主義，托洛斯基派雖堅持階級鬥爭、世界革命，但勢力甚微。列寧主義頗符合當時中國的革命情勢，國民黨透過聯俄容共政策稍加接納，獲得1920年代革命的成功。在此一大勢下，自由主義派的點滴改革、保守主義派的復辟反動，皆很少著力之處。中共在國民黨聯俄容共期間，欲奪取國民革命的領導權未果。被國民黨清出以後，主要勢力移於鄉區，僅能從事小區域的反封建鬥爭，對國民黨的政權並無撼動之力。1931年日本侵佔中國東北三省以後，始再揭櫫反帝鬥爭的大旗。當時國民黨正鼓勵企業家發展中國經濟，在鄉區繼續利用地主穩定地方。階級的矛盾，使中共在城區、鄉區均有發展的空間；而日本侵佔東北三省以後國民黨對日本的妥協政策，更突顯了中共反帝鬥爭的正義性。到1930年代中期，國民黨聯合中共共同抗日，中共以此得在共同抗日的大旗下，在各地區、各階層擴張勢力。在國民黨的治區，中共與爭取民主自由的小黨派聯合，暴露國民黨專制、貪污、腐化等方面的弱點，爭取國內外同情；在滲入敵後的日治地區，中共則進行反帝反封建鬥爭。

在此一政治背景下，進入1930年代以後，前此二十年的多元政治思想，有兩極化的傾向。1931年以後，日本侵略中國日亟，救亡的呼聲斲喪了多元思想的發展。由於團結禦侮的需要，不僅執政的國民黨推行「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法西斯主義，以武力與國民黨抗衡的中共，雖然以反法西斯為號，在其治區對「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要求更為嚴苛。國家主義派、保守主義派進入1930年代大部與國民黨合流；自由主義派左右於國共兩黨之間，殊少發展餘地。至1940年代後期，部分為國民黨吸收，部分則投向中共一方。1940年代後期，中共於日本投降後繼續從事反美帝鬥爭，並在日益擴大的控制區內從事反封建鬥爭。國民黨方忙於借用美國之力從事國家和社會復員工作，既無反封建鬥爭，亦無反帝鬥爭，對戰後的經濟蕭條、通貨膨脹、民生凋敝，一籌莫展，最後在國共鬥爭中歸於失敗。

1940年代國共鬥爭的成敗，繫於思想鬥爭的成敗；但並不意謂作為1920年代至1940年代主流思潮的「反帝反封建」，可以在不同的時空下永存。任何主流思潮都有它的時代性和地區性，如果僅從成敗考量，不從實質價值考量，掌理國政和謀求掌理國政者，須在諸多思潮中掌握主流思潮，不可逆勢而為。

The Flood of Political Ideas in China During the 1920's

(A Summary)

Chang Yu-fa

During the 1920's, several competitive political ideas prevailed in China, namely, socialism, nationalism, liberalism, conservatism, and Sun Yat-sen's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These political ideas were originated from the former decades; they becam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during the 1920's because some of them, reinforced by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believers than before. These believers founded or had founded political parties to propagate such ideas.

Socialism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There were different programs of socialism. Anarchism first got its believers in China among the revolutionaries led by Sun Yat-sen who began his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in 1894. Then came communism and guild socialism which got their believers separately during the May Fourth period.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1921, however, communism became the main stream of socialism. Sun Yat-sen's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were first propagated in the early 1900's. The first principle is concerned about nationalism; the second, about democracy; and the third, about livelihood. Partly because of his cooperation with the warlords and bureaucrats, Sun Yat-sen toned down his Three Principles in the early 1910's. During the May Fourth and post-May Fourth era, Sun found that the active young patriots needed a program for action. For the sake of enlisting the young patriots into his party, Sun once again took more time to enrich his Three Principles and to propagate them in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In an age of China's national humiliation, Sun Yat-sen's nationalism attracted a group of young intellectuals, who even went farther than Sun for the sake of protecting China from being partitioned by the Powers. In 1923, a flock of bandits kidnapped train passengers at the Lincheng station in Shandong province, and some of the kidnapped passengers were foreigners. At this moment, the foreign imperialists proclaimed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d no ability to govern China and China should be governed by the Powers.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a group of young intellectuals in Paris founded the Chinese Youth Party and took nationalism as the only direction of their action.

As there were different ism-believers among the partisans, there were different ism-believers among intellectuals. Some of the intellectuals sided with liberalism and some others, conservatism. The liberals thought that the Government governed the people too much; they tried to set up a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and fight for freedom and human rights. The conservatives thought that the Government changed China's institutions too much; they tried to preserve some of the traditional institutions to supplement the modern ones. Both opponents expressed their opinions in different media and through different channels, but got little response.

After years of competition, each of the political ideas got a multitude of people to

believe. The Kuomintang, believer of the Three Principles, came to power in 1928. Since then,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got more chance to be propagated and fulfille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believer of communism, became the main opposition, and communism still had chance to be propagated and fulfilled, especially in some places of the countryside fallen under the swa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hen the KMT and CCP became more and more competitive in the 1930's and 1940's, the Anarchists, members of the Chinese Youth Party, and part of the liberals and conservatives sided with the KMT, and the guild socialists, as well as the other part of the liberals and conservatives, sided with the CCP. It seems that there were no choice for the independents when the powerful man who had taken power of the nation asked for their allegiance.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